

##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Jeffrey Sachs 胡永泰 杨小凯\*

**摘 要** 本文研究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 论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例证, 本文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结论是, 在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 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 WTO 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 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关键词** 经济改革, 宪政转轨, 趋同和创新

### 一、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 其中之一由 Dewatripont and Roland (2000), McMillan (1996), Blanchard (1999), 及 Roland (2000) 综述。该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 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 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其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 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Sachs and Pistor, 1997)。经济转轨 (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 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 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 (Roland, 2000; Sachs and Wingthye Woo, 1999)。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下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若 19 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 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 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困难。首先, 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 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 持续

\* Jeffrey Sachs, 哥伦比亚大学; 胡永泰,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杨小凯, 莫纳什大学。通讯作者及地址: Xiaokai Y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Victoria 3168, Australia; 电话: (61-3) 99052448; Email: Xiaokai. Yang@BusEco. Monash. edu. au。此文是 2000 年同名英文文章的修改本 (Sachs, Woo, and Yang, 2000)。修改过程中得到林毅夫、姚洋及三位匿名审稿人的帮助。作者对文中错漏负完全责任。

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 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制度及政策,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法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 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负面的,<sup>1</sup>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sup>2</sup>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第一,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两难冲突: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Barzel, 1997)。Buchanan(1989)认为,产权从能够有效执行对盗窃的惩罚的警察部门的强有力(因而可信)和合法的暴力中产生。但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暴力通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这个两难冲突,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心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其次,第二个困难与另一个两难冲突有关: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 2000; 张五常, 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见第四、第五部分),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却相反。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

<sup>1</sup> 美国独立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 Nussbanm (1925), Taylower (1932), Philips (1929 : pp. 115—119), Deane and Cole (1967 : p. 48) 中有记载;美国内战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 Woodward (1951 : pp. 120—140) 有记载。这两个战争后,美国有十年都是负增长。

<sup>2</sup> Olson (2000) 认为由于治理国家的剩余收入要靠政治垄断来收集,所以政治垄断对提高治理效率有类似专利权的正面效果。但正像专利权产生了与垄断有关的信息歪曲,所以最优专利权年限是有限的,最优政治垄断期是非常有限的。经济学家对最优政治垄断期并无深入研究。有些宪政主义者认为,如果用成本—效益分析来处理宪政问题,执政者对宪政游戏规则承诺就不可信。宪政游戏规则应以对自由的信仰而不是以成本—效益分析为基础。

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再次，第三个困难涉及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似地，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的福利为代价。但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最后，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并非不可能，但非常困难。例如前述的法国大革命。又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中国，在缺乏市场和私有产权下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试验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大震荡，但为邓小平的市场取向改革扫清了道路。Mokyr (1990) 认为，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的激进转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杨小凯 (1994) 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分权试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此文并不讨论渐进改革和震荡疗法谁优谁劣，因为二者无法严格定义。此文注重于实证问题：什么是推动俄国和东欧进行与宪政改革并行的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例如俄国用计划经济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潜力已耗尽，所以渐进改革没有效；中国开始改革时这种模仿式的工业化潜力还很大，即使不改革，也可能重复20世纪50年代苏联10%以上的高增长。又如，东欧国家、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规模小，是他们对外界压力敏感、虚心学习制度、改革快而成功的原因。

此文也注重不改宪制规则的经济改革的两难冲突。这种改革（在发展市场时）保留了歧视性的特权制度，游戏规则和价格双轨制，因而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坏资本主义”（即保留精英对政治垄断条件下的自由市场）。其长处是可能有效赎买特权阶级，减少上层对改革的阻力，尽管它可能增加下层的反弹（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是这类反弹的代表）。双轨制、乡镇企业等都不是制度创新，改革并未创造出什么优于好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只是一个向好资本主义（指在没有精英政治垄断条件下的自由市场制度）过渡的过程。

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短期内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Qian, 1999）。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为重要。

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在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本身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 Barzel (1997) 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 Buchanan (1989) 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和太特定,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 Lardy (1998) 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 North (1997),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钱颖一和 Weingast (1997), Sachs (1993), Sachs 和胡永泰 (1999) 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研究经济转轨,当正式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第二、第三部分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杨小凯 (2003) 里的斯密模型来研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第四、第五部分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

## 二、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必须关注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与第二个问题相关的是: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本节将回答这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该区别解释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Lange, von Mises, 和 Hayek 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von Mises (1922) 和 Hayek (1944a) 相信,由于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Lange 和 Taylor (1964) 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归国家所有。中央计划者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

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Hayek (1988) 和 Friedman (1962) 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以便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Kornai (1980) 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之一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 (1988)，易纲 (1988)，平新乔 (1988) 和孟庆国 (1988) 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 (Furuboth and Pejovich, 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在没有产权结构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 (1986, 1999) 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不可能硬化，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孟庆国 (1988) 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是一种制衡机制，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一起提供了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

张五常 (1974) 与 Shleifer 和 Vishny (1992, 1993) 发展了一种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的价格控制理论。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即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Shleifer 和 Vishny 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都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Shleifer 和 Vishny 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

话,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sup>3</sup> 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 1986)。但这个结论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取得了1933—1940年间年均8%,和1948—19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sup>4</sup> 为什么 von Mises 和 Hayek 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von Mises、Hayek、Friedman、张五常及 Shleifer 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该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

Sachs (1996), Sachs 和胡永泰 (1999) 以及杨小凯 (1994) 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如 Xiaokai Yang (2003) 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Ng 和 Xiaokai Yang (1997, 见 Sachs and Xiaokai Yang : c. 15) 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表明经济发展是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 Ng 和 Xiaokai Yang (1997) 所示,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社会试验已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进行模仿。发达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 von Mises 和 Hayek 没有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这里简要勾勒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

(1) 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

<sup>3</sup> 近来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捍卫能从 Bardhan 和 Roemer (1993) 中找到。

<sup>4</sup> 俄罗斯在两个阶段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见 Mitchell (1998, p. 912, p. 919)。这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在苏联解体在即时感觉到苏联经济体制将要发生的崩溃 (Skousen, 1997)。

(2) 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工业投资规划，在多种工业品市场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大跳跃，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

(3) 中央计划当局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中国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中央计划当局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机构之间的分配建立起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

(4) 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能较好的接近 Leontief 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sup>5</sup>然而，Leontief 投入产出法不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激励机制。Roland (2000 : c. 1) 指出，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sup>6</sup>

(5) 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其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清洗运动来实现的。<sup>7</sup>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Hayek 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

Sachs (1996) 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时，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通常遵循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着是经济制度，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来是法律体制，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如代议制民主；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

<sup>5</sup> 对于苏联式经济体制下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1984）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sup>6</sup> 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文献集中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4）上，而几乎没有关注特征（2）、（3）和（5）。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综合性的政府投资规划比日常生产计划的平衡重要得多。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集中在特征（5）上。

<sup>7</sup> Riskin (1987) 和世界银行（1984）记载了建立一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

和行为规范。North (1994),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指出, 在英国, 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 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 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 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 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North 相信, 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慢得多。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毛泽东在 1956 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泽东, 1977a), 是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产生差别的大背景。

毛泽东倡导行政分权, 倡导每个企业、县、省的自给自足, 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 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毛泽东, 1977b)。这样, 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 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 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协调机制的真空: 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sup>8</sup>

关于转轨经济的 1996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 尽管有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工业化的成果, 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 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 农业雇用了 71% 的劳动力, 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 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 20% 的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和苏联相比, 中央计划和管理少得多。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 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 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 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严厉地控制, 控制一旦解除, 立即有所报偿。这样,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 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中国 18% 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 前苏联 85% 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 (Sachs and Wingthye Woo, 1999: 表 6)。从 1985 年起, 前苏联劳动力的 99% (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 14% 劳动力) 被给予“铁饭碗”(Cook, 1993: 对苏联工人保障的文献记录)。在东欧, 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据 Xiaokai Yang、Wang 和 Wills (1992) 记载, 直到 1978 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 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

<sup>8</sup> 钱颖一(即出)记载了毛泽东在 1958—1960 年和 1969—1975 年的两次行政分权。从那时到改革时代制度安排的演进特征, 也能通过把以下信息源汇集而确定: Bruun (1993), Granick (1990), Liu, Yialing (1992), Nee, V. and Sijin (1993), Oi (1986), Perkins (eds, 1977), Riskin (1971, 1987), Schurmann (1968), Solinger (1992), Vogel (1989), Walder (1986, 1992), Wank (1992), Wong (1985, 1986a, b)。

是0.3,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所以中国农村改革容易,城市改革更加困难(Byrd, 1983, 1988, Byrd and Tidrick, 1987)。同样,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

如果一个经济通过中央集权的大推进工业化相当成功地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那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体制就被包容进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高劳动分工水平。既然劳动分工的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由中央计划体制协调,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与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协调失灵往往如影相随。如果改革渐进发生,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可能震荡疗法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个庞大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投入产出网络的瘫痪也许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相当发达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通过震荡疗法取消。因为整个转轨期间,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

1958—1961年和1966—1970年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中央计划体制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1971—1976年间也经历了行政分权政策的震荡过程。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中国改革以来的区域分权制度化了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Yingyi Qian and Roland, 1998, Yingyi Qian and Weingast, 1997)。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Zhuravskaya, 1998, Yingyi Qian, 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不应过高估计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其仁, 1999; 何清涟, 1997: p. 206),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Lardy (1998: p. 204)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差别极大。例如,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中国大城市中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政府重罚,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sup>9</sup>

<sup>9</sup> 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见程(1991),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该论文的最新版本也能从程得到。根据他的信息,在中国,市民比农民有更多的投票权。

进入改革时代,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是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新兴工业化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该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加工出口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受到更好的保护。依照杨小凯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Xiaokai Yang, 1999)以及杨小凯和Ng, Y-K. 的间接定价理论(Xiaokai Yang and Ng, 1995),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

在区域分权的改革时代具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政治权力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据Lardy(1998)的文献记录,当时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国有部门都在扩张。不同于苏联式制度的是,中国的不同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中国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第五部分将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征。

总之,中国20世纪80—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

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误解造成了关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之间比较的许多误导观点:

首先,一些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估计过高,Sachs and Wingthye Woo(1999)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30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增长迅速,1986—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人均GDP增长率在5.6%—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有相同的,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地区5.8% 韩国7.4% 新加坡7.4% 台湾地区6.3% 印度尼西亚4.7% 马来西亚4.5% 泰国4.6%。另外,在中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Lardy(1998)指出,官方数据至

少高估增长率1%—2%。一些中国学者，例如罗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1版）认为，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2%—3%。Lardy（1998）提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于国有银行坏账和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信息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2002年10月20日报导，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大约在5180亿美元，占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43%。相比之下，美国10多年前扶植储蓄和信贷行业困境的纾困计划，总额只有1600亿美元，仅占当时美国GDP的3%。只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印度尼西亚银行坏账程度跟中国目前的情况大体接近。Lardy在评价中国国有银行大量坏账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和金融危机之间缺少的只是“一根导火线”。

Wolf（1998：p.17）证明，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因此，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与增长率的差别相比，必须给予前者更多的关注。

一些经济学家论证，中国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成功的转轨不是必要的。其他经济学家（Yingyi Qian，1999）把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看作是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的主要解释，这些都不是令人信服的。既然后共产主义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体制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义，东欧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一定比中国不同省区制度试验的多样性大得多，如果财政联邦主义是转轨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决定因素，那么应该有更好转轨绩效的是东欧而不是中国。据前面讨论的，不同的起始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模仿空间，以及不精确的中国官方数据解释了转轨绩效的差别。

### 三、转轨的推动机制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杨小凯，2003：第1章），这表明在西欧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非常大国。许多小国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政府的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慢，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如英国和日本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西欧的文艺复兴在巩固西欧分权政治结构上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层次上，人类和生活本身的价值被放到了复兴了的哲学思索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层次上，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竞争的城市国家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合同法、运输法、担保交易的市场制度一起激发起国际贸易的需要。由Machiavelli的《君主论》圆满完成的政治思考，探讨了君主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使国家强大的方式，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

整个欧洲史上,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区发生, 在它们被觉察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 或者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统治, 模仿而传播到其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 新的欧洲思想和制度传播进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内陆地区、大的封闭社会, 比起传播进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 要不成功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 也许在经济改革中, 小就是美。<sup>10</sup> 无论如何, 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有过世界上所有传统社会接受来自海外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最困难时刻, 即使当时那些制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成功记录。

Sachs 和胡永泰 (1999) 以及 Roland (2000) 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 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 能更好的管理迅速的转轨 (Sachs and Wingthye Woo, 1999 : p. 14)。1989 年在越南一个相当成功的东欧式振荡疗法改革也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规模较小。

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亚洲当前的转轨经济, 提供了转轨试验中的国家和文化的充分大的多样性, 人类社会还从没有过如此丰富的此类转轨的制度试验经验。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选择各种转轨模式和速度的试验, 可以提供迅速获取有关转轨的制度知识的机会。

许多经济学家论证说,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 如前苏联和 1949—1979 年的中国, 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其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 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 (地区), 如台湾地区和韩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意识到这样行不通, 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 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和财阀制度。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 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 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 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荡疗法转轨之后, 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坏资本主义行为准则。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最近 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2), 以及 North, Slimmerhill 和 Weingast (2002) 用西欧与东欧、南欧的比较, 南美北美的比较及经验证据支

<sup>10</sup> Pipe (1999 : p. 152) 认为中世纪议会制度在英国的兴起和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衰落的原因是英国相对于西班牙和法国规模小。

持以上看法。按他们的经验证据，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荷兰而不是在西班牙先发生，正是因为前者先实现了宪政共和，而后者尽管有更多的殖民地和太平洋贸易提供的机会，却因专制制度而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南美也因为政治精英的垄断而比自由共和制的北美在经济上大大落后。有人认为印度是民主制度不足以产生成功经济发展的反例，我们不接受这一观点。即使经济起始条件没有中国好，印度在二战后由于民主制度而没有出现1959—1961年发生在中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饥荒。按 Sen (1981) 的理论，这种大规模饥荒不是由粮食短缺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专制的政治制度导致。从这点而言，印度的经济发展比1949年以后的中国成功。若考虑到 Sen 的观点，“自由有其本身的经济价值”，这一结论就会更加明显。另外，印度二战后经济发展绩效差强人意，是因为二战后它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国有制，搞了很多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而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

上述经验表明，制度核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Sachs and Wingthye Woo, 1999)。Roland (2000: pp. 125—136, pp. 315—324) 综述了东欧和俄罗斯极其丰富的迅速私有化制度试验，下面简单概述这一综述。

在波兰有人提出了一种让分散所有权的外部人、共同基金和银行参与的私有化模式，但被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阻挠了4年。相似的方案在捷克被接受。Roland 用两国不同的起始条件来解释差别。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经济改革的以往记录，因此没有工会，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没有削弱。几乎平衡的初始宏观经济状况显示出软预算约束问题不像波兰那样极度盛行。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从波兰的失败得出了教训，选择了无偿给内部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的私有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通过减少在位管理者的抵制而增强了事前的可接受性。当人们通过代金券方案成功地接受了股份，捷克的私有化方案也获得了事后的政治支持。

台湾地区和前东德采取了国有企业从上至下出售给外部人的作法 (Lau and Song, 1992 和 Roland, 2000)。这种政策没有所有权转移和外部基金供应的互相脱节的特征。台湾地区采取了所有重要的自由化改革之后进行私有化的程序。在那里，转轨更多地与新的私人企业的发展相结合，而更少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结合。一般来说，在这两个国家（地区），这种从上至下出售的方式证明是非常缓慢和不方便。

波兰和匈牙利采用了从下至上出售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模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以逐步的方式出售。私有化最常见的形式是从下至上方式由几个潜在的买主之一，内部人或外部人，表示出对买一个企业有兴趣。出售给国内买者的方式多数采取以非现金投标销售形式，如租赁、局部购买、分期付款、签订债务合同，分期付款的购买等。

这些试验表明,为了获得企业与管理者之间有效的匹配,替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无偿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原则上比无偿给内部人的私有化好。然而,如果私有化导致分散的外部所有权,这一论断不一定正确。这归因于众所周知的与分散的所有权相关的搭便车问题,小股东没有足够的激励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但却从它的结果中得利,因此分散的所有权导致了对在位管理者的不充分监督。然而,这种有效的私有化模式也许遭到来自内部人的抵制,这表明了很低的事前政治可接受性。

## 四、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

有两种转轨模式,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另一种在中国和越南采用。前者市场取向改革只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后者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政治垄断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本节首先考虑前一种转轨模式。

一些经济学家,如钱颖一(1999)论证说,中国成功的渐进式和双轨制转轨,对于向宪政秩序转轨是经济改革的根本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Lardy(1998),Sachs和胡永泰(1999)不同意。他们认为,许多国家已有的制度试验的极大多样性足以保持对传统看法的信念,中国的经验不足以提供改变这一信念的信息。在欧洲和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下,制度试验的多样性比在中国大得多,因此东欧和俄罗斯决定向宪政秩序的西方模式转轨。但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 例1 俄罗斯的宪政转轨

Sachs and Pistor(1997:pp. 3—5)指出,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在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的转轨第一阶段里,改革是在旧的共产党政权下实施的。在此期间,由三个重要支柱: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构成的经济改革开始进行。从一开始,所有措施依然不完备,其中一些在此期间失败了。改革受阻与缺乏宪政秩序相关联: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的手段来实施改革,尤其面对着来自苏联时代最高苏维埃根深蒂固的反对。同等重要的是,政府缺乏对其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以至于许多改革的机会被官员滥用职权和腐败破坏了。

例如,稳定化的失败可直接追溯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为:它发行了巨大的通货膨胀信贷。信贷的激增主要在前苏联联邦银行的首脑1992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主席之后发生。1992年到1993年间,俄罗斯中央银行以强加在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税进行资金转移的方式,把国民收入的巨大比重(1992年GDP的约40%和1993年GDP的约20%)转移到关键压力集团、政府和银行等政治宠儿以及首脑官员的各个密友手中。银行的账目无法审计,无法追查的资金大量流失。

产生所有这些扭曲的共同因素,是政府决策和行政缺乏法治。程序是因人因事而异,不透明的,时常是腐败的。公民社会太软弱而不能给予重要的制衡压力,因此大多数滥用权力的事件未受制止。制定决策不是被普遍适用的一般法律规范所指导,而是迎合特定的企业和压力集团的特别需要。

第一阶段经历了把这个国家带到内战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爆发。第二阶段,从1993年10月直到目前,经历了在第一阶段获利最多的那些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巩固。这种巩固伴随着正式法律,或起码更有条理的规则的治理。国家杜马在新规则下运作,选举按如期在1995年12月进行;总统选举按计划于叶利钦的5年任期后举行。与此同时,许多深层次的宪政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和总统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的斗争以一种新的,减少了戏剧性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总统机构大部分处于宪政约束和公众监督之外。

在俄罗斯,法治是否已经取得权威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尊重法治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门之间分配,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面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通过公平选举提供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Sachs and Pistor, 1997),把主权置于预设的法律约束之下,这影响着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在这种约束下,任意的国家干预被最小化,作为一个调节者、税收管理人和强制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为,变得公正并可预见。

改革司法制度,培训和(或)替换它的职员,用新法律代替现有法律都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是否对法治有明确的承诺。这样一个承诺的指标包括分权制衡、公民自由、独立司法和权力有序转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judicial review)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

1991年以前的俄罗斯几乎没有满足法治的特征。从1996年起许多重要的成就已取得,一部新宪法开始实行,尽管有人对它被批准的程序质疑,但它显然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两次议会选举据这部宪法按时进行,最重要的是,总统选举已经进行,未成功的竞争者也认输(选举失败者不认输是宪政在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按宪政规则,通过公平竞争和平转移权力也已实现。

这些成就是显著的和真正重要的。但俄罗斯仍然没有经历一个真正的和平政党轮替(叶利钦和普京可以说是属于同党),所以新宪政秩序最艰难的检验仍未见到。

新宪法承认权力的分离,但最近的一个检测显示出这些名义承诺的局限性。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不清,最明显的是分配给总统的立法权力。总统可以通过命令统治,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样有约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的大多数规定都经不起宪法学家的严格推敲。宪法缺乏确定性的程序化保障条款来确保包括法律平等保护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实现。俄罗斯有很多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设计的特殊法,为税收豁免、个别私有化计划,以及对那些最受惠于总统命令权的人给予权利上的分配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结果是,国家保留了大范围的专制,不仅造成了不确定性,也提供了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歧视性是不相容的。

Gray 和 Hendley(1997)阐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私人交易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当的法律,健全的司法执法制度,以创造对法律和立法制度需求的激励为基础的市场。在与匈牙利商业法发展相比较的描述中,他们指出,有效的司法执法制度的发展,在俄罗斯和其他转轨经济国家是最难完成的任务。俄罗斯仍不能提供以法律为基础交易的第一条件:减少交易费用并能使私人参与者调动他们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正当法律。Pistor(1997)探讨了在私有化的开端,缺乏一部有助于产权的发展和后私有化公司治理的发展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也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做出的政策选择方面,探寻了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颁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她论证说,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经济改革以任意行政决策权为基础,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的发展和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

Sachs 和 Pistor(1997)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法治的特殊国情论和缺乏经济自由的特殊国情论的根源很深。特殊国情论可追溯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实际上,在亚历山大二世着手他的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尝试的19世纪中期,特殊国情论已经有很大影响(Owen,1997)。特殊国情论能追溯回几个世纪,追溯到莫斯科公国的开始。

在莫斯科公国摆脱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后,法律扮演着一个与西欧相比显然不重要的角色。西欧法律的形成阶段在中世纪欧洲罗马法的应用,君主们和教皇对政治权威和立法权的争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只间接地与俄罗斯接触。同样重要的是,16世纪后俄罗斯的东正教被归入国家权力,沙皇同时是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脑。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中在单个统治者手中的关键堡垒之一。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与国家对于统治的权威、习惯法、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的标准中扮演着基本角色。在俄罗斯则相反,斗争以教会从属于国家统治而告终。

宪政主义的好处与对灵活、巨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Hellman,1997),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论战的焦点。Shleifer(1994,1998)提出一个论据来支持俄罗斯的震荡疗法:与改革的渐进方式相伴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接下来又说,因为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因此,开始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在

东欧和俄罗斯见到的那种私有化改革去掉政府官员的控制权。但正如 Sachs 和 Pistor(1997)所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

Hellmar(1997:p.58)提供了在东欧和中欧增长绩效与宪法的通过之间相关的经验证据。这个结果不令人信服,因为宪政规则的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宪政规则的转轨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负面效应相比,当前俄罗斯转轨困难并非偶然,也不能归咎于震荡疗法。但是由于俄罗斯缺乏任何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个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不利于转轨的历史。

许多学者把俄罗斯不佳的转轨绩效归咎于法律执行不力。然而 Pistor(1997)指出,执行不力起因于不可接受的法律和国家机会主义。North(1981:p.147,pp.158—170)作的18世纪英法之间的一个比较也表明,在英国,出色的国家税收和法律执行能力归因于公正的宪政秩序;在法国,旧王朝极差的税收和执法能力归咎于国家机会主义和缺乏公正的宪政规则。

## 五、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 Pilon(1998)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特征,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sup>11</sup>

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的,这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为例说明。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天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他行业。在这30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20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Huang,1993:p.88)。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的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是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在许可证申请者运作的行业中有既得利益。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如限制私人企业上市和经营证券业务,使股市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圈钱的工具。2002年中国95%以上的上市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见“我国上市公司结构呈极不合理状态”,北京世纪经济研究信息中心:《每日财经快讯》,第253期,2002年7月31日)。

Mueller(1998)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

<sup>11</sup>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历史及近来的修改,见 Pilon, 杨小凯(1994)和钱颖一(1999)。

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主要参与者、执行规则的仲裁者都是同一国有组织,因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僵化的成立企业的政府批准制度,除了海南省以外,既没有公司的自由合伙,也没有公司的自动登记(茅予轼,1999,1998)。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

Bai (1999) 认为,在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存在对私人企业意识形态上的歧视。文件证明,不同层次的政府倾向于强加给私营企业各种税和费,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收入。一项 1988 年辽宁省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税和附加费加在一起将取走可观察企业利润的 63%。当 20 种不同的收费被算进去后,税务负担甚至更高。这样的税务负担使得私营企业除了通过隐瞒交易和收入来逃避税费的办法外,难以生存(《中国经济年鉴》,1989:p.107)。十年以后,一项 1998 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研究报告说,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的 10%,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超过 10%。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 50 多种,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这项研究得出结论:不想关闭其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农民也是过多税费的主要受害者,整个改革期间,政府对农民作了减少随意征税的无数许诺,然而随意征税仍旧很普遍。在一些地方,向农民索取 61 种不同类型的收费(丁国香,严庆珍,杨勋主编,1995)。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但是在现行宪政规则下,那些法律,如 1994 年通过的《合同法》,1993 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许多方面不能贯彻执行。杨小凯(1998)提到了《公司法》和现行宪政规则的不相容性, Mueller (1998:p.200) 提到电信行业的国家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不相容性。可以下结论说,许多对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现行的宪政规则下不能运作。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下面的例子可以阐明这一点。<sup>12</sup>

## 例 2 中国的乡镇企业

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被一些经济学家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的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

<sup>12</sup> 关于双轨制的代价见 Roland (2000:p.15,p.198),及北京世纪经济研究信息中心(2002):“邱晓华,价格‘双轨制’给了中国富人 6000 亿财富”和“电信接入费被认为是计划经济行为”(载每日财经快讯,第 318 期,2002 年 11 月 4 日)。

企业的真正私有化，中国农村经济将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Sachs and Wingthye Woo, 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在文革期间被奠定，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的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列为乡镇企业。出于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存在很大差别。

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苏南模式，主要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江苏省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实施牢固的控制（例如，参与投资决定，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并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但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于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政府付费，是一种被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sup>13</sup>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苏南模式被认为是最佳的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其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方式最接近。<sup>14</sup>然而，就像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4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sup>15</sup>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制：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这种双轨制表明在技术效

<sup>13</sup> 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企业动摇保护盖”，《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sup>14</sup> 周其仁，“反思农村金融——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董辅初，“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吴敬琏“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及走势”。见新华社2001年6月30日电讯。

<sup>15</sup>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功结合”，《中国日报》1993年12月15日。江苏省经贸委文件“不断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加快发展私营个体经济”，[http://61.155.107.237/ArticleDetailSearch.aspx?Article\\_ID=135](http://61.155.107.237/ArticleDetailSearch.aspx?Article_ID=135)。“江苏省乡镇企业‘十五’发展计划”，[http://61.155.107.237/ArticleDetailSearch.aspx?Article\\_ID=128](http://61.155.107.237/ArticleDetailSearch.aspx?Article_ID=128)。

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 X 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Alwyn Young (1999) 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曲的经验证据。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既然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因此产生了不公平、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的游戏规则。

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许多中国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敬琏(1998)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在党组织里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利,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有点像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中国式类封建制度的特征(何清涟,1997)。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家警察执行法庭命令。禹是村长、党支部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他控制着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的司法权。许多媒体报道也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然后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何清涟,1997)。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政府官员有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有当地户口的村民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外来移民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由其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这种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了低的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它们并不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低劳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制度不仅歪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按照周其仁(2002)的看法,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不同于自由经济中的合作制,前者是类似封建制的一种政治制度,而后者是以私人财产制为基础的自愿合

作。<sup>16</sup>但这一制度又与西欧的封建制度不同。西欧的封建制度是种契约制度，因此是现代代议制（以契约为基础的政府）的温床。但中国乡村的干部是由上级政府指定的，没有自己独立的缔约权。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人的，经常在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中国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已被质疑：在台湾地区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整个东亚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盛行。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色，看来是私人、家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

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Oi，1995；Walder，1995a）。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Naughton（1994a）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1993）。

Sachs 和 Wingthye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政府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年至1995年间，即使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Xiaokai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Yialing 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sup>17</sup>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面临的歧视，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钢（1993）用“非集体乡镇

<sup>16</sup> 周其仁，“放弃农地的代价——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六）”及“‘国土制’剥夺农民——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七）”，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周其仁专辑：<http://www.ccer.edu.cn/cn>。

<sup>17</sup> 尽管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Lardy，1998：pp. 53—57）。

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所有方面(比起)情况相当的集体乡镇企业,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如外部性等)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政府强加的约束所造成的。特别是银行因为政府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 1994)。文贯中和新望(2002)记载的苏南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衰落和两次改制的详细情况证实了Sachs和Wingthye Woo在1999年所持的这一观点。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Sachs和Wingthye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的两种,苏南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Oi, 1995)。又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言之,乡镇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了委托—代理问题,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sup>18</sup>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Yusheng, 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当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才有可能继续有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江苏和山东,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视。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的经济空间,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资产将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年至19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sup>18</sup> 尽管Walder(1995a)不接受“私人激励”假说,他承认它的合理性。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了范围。但有一个问题，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作为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地方政府通常要求“离婚”的高额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司与国有企业合并（“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中国日报》，1994年10月4日）。

## 六、总结性评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本文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结论是，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Liu and Xiaokai Yang (2001) 对内生分工网络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这一结论提供了理论证明。他们的模型说明，在维持精英阶级政治垄断的条件下推行除政府垄断之外的所有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自由市场时，政府服务质次价高，产生反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非政府部门被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剥削，因此市场容量小（看起来像通货紧缩），分工水平低，总和生产力低。只有政治上允许自由进入也形成自由市场时，这种“坏资本主义”才能被高效率的“好资本主义”代替。最近，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2) 为此论提供了西欧、东欧、南欧比较史上的证据，North, Summerhill 和 Weingast (2002) 也用南美、北美经济比较史对此论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不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创新过程，指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 WTO 规则趋同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MIT, 2002.
- [2] Bardhan, P. and J. Roemer, eds.,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Barzel, Y.,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 memo, and "Third-party Enforcement and the State", mem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7.
- [4] Beik, Paul H.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 [ 5 ] Blanchard , Olivier , *Economics of Post-Communism Transition*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 [ 6 ] Bruun , O . , *Business and Bureaucracy in a Chinese City* , Chinese Research Monographs , No. 43 . Berkeley :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93 .
- [ 7 ] Byrd , W . , “ Enterprise-Level Reforms in Chinese State-Owned Industry ”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83 , 73 , 329—332 .
- [ 8 ] Byrd , William ,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 New York : M. E. Sharpe , 1991 .
- [ 9 ] Byrd , W . and G. Tidrick , “ Factor Allocation and Enterprises Incentives ” , in Tidrick , Gene and Chen , Jiyuan , eds . , *China 's Industrial Reform*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
- [ 10 ] Chang , Chun and Yijiang Wang , “ The Nature of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1994 , 19 , 434—452 .
- [ 11 ] Cheng , T . , “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 's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 , Ph. D. Dissertatio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North-East University , 1991 .
- [ 12 ] Cheung , S . , “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 ,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1974 , 17 , 53—71 .
- [ 13 ] Cheung , Steven N. S . , “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 ,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 1996 , 14 , 1—5 .
- [ 14 ] Cook , Linda ,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 Cambridge ,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 [ 15 ] Crafts , N . , “ Endogenous Growth : 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 History ” , D. Kreps and K. Wallis eds . ,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 [ 16 ] Deane , Phyllis and William , Cole ,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7 .
- [ 17 ] Dewatripont , Mathias , and Gérard Roland , “ Transition as a Process of Large Scale Institutional Change ” , in David Kreps and Kenneth Wallis , eds . ,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 [ 18 ] 丁国香、严庆珍、杨勋等，《中国农村改革纪实》。西安：陕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
- [ 19 ] Friedman , M . ,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2 .
- [ 20 ] Furubotn , E. and S. Pejovich , eds . ,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 Cambridge , Mass . :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1974 .
- [ 21 ] Granick , D . ,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 A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0 .
- [ 22 ] Gray , Cheryl and Kathryn , Hendley , “ Developing Commercial Law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 Examples from Hungary and Russia ” , in J. Sachs and K. Pistor , eds .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7 .
- [ 23 ] Hayek , F . , *The Road to Serfdom*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44 .
- [ 24 ] Hayek , F . , *The Fatal Conceit :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8 .
- [ 25 ] 何清涟，《当代中国资本积累》。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
- [ 26 ] Hellman , Joel , “ Co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 , in Sachs and Pistor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7 , p. 56 .
- [ 27 ] 华生、张学军、罗小朋，“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第13—15页。
- [ 28 ] Huang , Z . , “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Firms in the Mainland China ” , *Economic Outlook* , 1993 , 8 ( 32 ) , 87—91 .
- [ 29 ] Kornai , J . , *Economics of Shortage* . Amsterdam : North-Holland , 1980 .

- [ 30 ] Kornai, J. , "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 Visions , Hopes , and Reality "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December 1986 , 24 , 1687—1737.
- [ 31 ] Lange, J. and F. Taylor ,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 New York : McGraw Hill , 1964.
- [ 32 ] Lardy , Nicholas , *China '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98.
- [ 33 ] Liu , Wai-Man , and Xiaokai Yang , " Good Capitalism versus Bad Capitalism : Effects of Political Monopoly of the Ruling Elite 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 Income Distribution , and Development "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s , Monash University , 2001 , No. 01/01 , ISSN 1441—5429.
- [ 34 ] Liu , Yialing , " Reform From Below :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 , *China Quarterly* , 1992 , 130 , 293—316.
- [ 35 ] 茅于軾 , "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 and 帮助就业 " , 《经济学消息报》, 1999 年第 37 期 , 第 1 页。
- [ 36 ]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 第 5 卷。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7 年。
- [ 37 ] Mao , Tse-tung ,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 Translated by Moss Roberts , annotated by Richard Levy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Peck.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7.
- [ 38 ] McMillan , John , " Markets in Transition " , in David Kreps and Kenneth Wallis , eds. ,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 39 ] 孟庆国 , " 现代企业产权结构 " , 天津 : 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 , No. 4 , 1988.
- [ 40 ] Mitchell , B. R. ,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 Europe , 1750—1993* . London : Macmillan Reference ; New York : Stockton Press , 1998.
- [ 41 ] Mokyr , Joel , *The Lever of Richs :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 42 ] Mueller , M. , " China 's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nd the WTO : Can China Conform to the Telecom Regulatory Principles ? " in James Dorn , eds. ,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Washington D. C. : CATO Institute , 1998.
- [ 43 ] Nee , V. and S. Sijin , " Local Corporatism and Informal Privatization in China 's Market Transition " , Working Paper on Transitions from State Socialism , No. 93—2 , Einaud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Cornell , 1993.
- [ 44 ] Ng , Y-K. and X. Yang , " Specialization , Information , and Growth : a Sequen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 ,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997 , 1 , 257—274.
- [ 45 ] Nolan , Peter , *State and Marke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 Essay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 London : MacMillan , 1993.
- [ 46 ] North , Douglas ,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 in North ,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 Norton , 1981.
- [ 47 ] North , D. , "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94 , 84 , 359—368.
- [ 48 ] North , D. , "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 " , *WIDER Annual Lectures* , March 1997.
- [ 49 ] North , D. , Summerhill , W. , and Weingast , B. , " Order , Disorder , and Economic Change : Latin America vs. North America " , in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Hilton Root , eds. ,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 50 ] North , Douglass and Barry , Weingast , "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1989 , XLIX , 803—832.
- [ 51 ] Nussbaum , Frederick , " American Tobacco and French Politics , 1783—1789 "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1925 , 40 , 501—503.
- [ 52 ] Oi , J. , " Commercializing China 's Rural Cadres " , *Problems of Communism* , 1986 , 35 , 1—15.

- [ 53 ] Oi , Jean , " The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s Transitional Economy " , *China Quarterly* , 1995 , 144 , 1132—1149 .
- [ 54 ] Olson , Mancur , *Power and Prosperity —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 New York : Basic Books , 2000 .
- [ 55 ] Owen , T. , " Aut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n Economic History " , in J. Sachs and K. Pistor , eds.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7 .
- [ 56 ] Pei , M. , "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 , in James Dorn , eds. ,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Washington D. C. : CATO Institute , 1998 .
- [ 57 ] Peng , Yusheng , " 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 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 "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92 , April , 57 ( 2 ) , 198—213 .
- [ 58 ] Perkins , D. , " Reforming China 's Economic System "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1988 , XXVI , 601—645 .
- [ 59 ] Philips , Ulrich , *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 . Boston : Little , Brown , and Company , 1929 .
- [ 60 ] Pilon , Roger , " A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for China " ,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Washington D. C. : CATO Institute , 1998 .
- [ 61 ] 平新乔 , " 所有权、产权与管理 " , 《中青年经济论坛》 , 1988 年第 4 期 .
- [ 62 ] Pipe , R. , *Property and Freedom* . New York : Alfred Knopf , 1999 .
- [ 63 ] Pistor , K. , " Company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ussia " , in J. Sachs and K. Pistor , eds.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7 .
- [ 64 ] Qian , Y. , " The Process of China 's Market Transition ( 1978—1998 ) : The Evolutionary , Historical ,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 forthcoming .
- [ 65 ] Qian , Yingyi , "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 's Market Transition " ,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999 .
- [ 66 ] Qian , Yingyi , and Barry R. Weingast , "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1997 , Fall , 11 ( 4 ) , 83—92 .
- [ 67 ] Qian , Yingyi and Gérard Roland , "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98 , December , 88 ( 5 ) , 1143—1162 .
- [ 68 ] Riskin , C. , " 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 , *China Quarterly* , 1971 , 46 , 245—273 .
- [ 69 ] Riskin , Carl , *China 's Political Economy :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
- [ 70 ] Roland , Gerard , *Politics , Markets and Firms :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 Cambridge , MA : MIT Press , 2000 .
- [ 71 ] Sachs , J. , " Notes on the Life Cycle of 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 " , *Japan and World Economy* , 1994 , 8 , 153—174 .
- [ 72 ] Sachs , J. and Pistor , K. , " Introduction : Progress , Pitfalls , Scenarios , and Lost Opportunities " , in J. Sachs and K. Pistor , eds.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7 .
- [ 73 ] Sachs , J. and W. T. Woo , "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1994 , June , 18 ( 3 ) .
- [ 74 ] Sachs , Jeffrey , and Wing Thyee Woo , "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 , *Economic Policy* , 1994 , April , 18 ( 1 ) , 102—145 .
- [ 75 ] Sachs , J. and W. T. Woo , " Understanding China 's Economic Performance " ,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s* , forthcoming .
- [ 76 ] Sachs , J. , Wing Thyee Woo , and Xiaokai Yang , "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2000 , 1 , 260—274 .

- [ 77 ] Sachs, J. and X. Ya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 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es*. Cambridge, MA : Blackwell, 2000.
- [ 78 ] Schurmann, H.,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 79 ] Sen, A. K., *Poverty and Famines :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 Clarendon, 1981.
- [ 80 ] Shleifer, Andrei, " 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133—150.
- [ 81 ]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 Pervasive Shortages Under Socialism ",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23, 237—246.
- [ 82 ]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 The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 [ 83 ] Skousen, Mark, " The Perseverance of Paul Samuelson 's Economics ", *Journal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7, 11, 137—153.
- [ 84 ] Solinger, D., "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edited by A. Rosenbaum.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92, 121—142.
- [ 85 ] Taylower, George, " Wholesale Commodity Prices at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1732—1792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32, 4, 367.
- [ 86 ] Walder, A., " The Informal Dimension of Enterprise Financial Reforms ",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 S.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630—645.
- [ 87 ] Walder, A., " Local Bargaining Relationships and Urban Industrial Finance ", in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 Mao China*, edited by K. Lieberthal and D. Lampt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08—333.
- [ 88 ] Walder, Andrew, " China 's Transitional Economy :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 *China Quarterly*, 1995, December, 144, 963—979.
- [ 89 ] Wank, D., *From State Socialism to Community Capitalism : State Power, Social Structure,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a Chinese City*, Unpublished Ph.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 [ 90 ] 文贯中、新望, "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 《当代中国研究》, 2002年第2期, 第16—29页。
- [ 91 ] Wong, C., " Material Allo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 Impact of the Local Sector on Industrial Reform ",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 Mao China*, edited by E. Perry and C. Wong.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92 ] Wong, C., "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nd Problems of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6, 10, 363—387.
- [ 93 ] Wong, C., "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Chinese Industry : The Maoist Legacy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80s ",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ward the Year 2000*,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 S.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571—602.
- [ 94 ] Woodward, C.,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New York, 1951.
- [ 95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1984.
- [ 96 ] Von Mises, L., *Socialism :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 Liberty Classics, 1922, reprinted in 1981.
- [ 97 ] Yang, X. " A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Russia ", A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HIID seminar, 1994.
- [ 98 ] 杨小凯, 《当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 [ 99 ] Yang , X. , *Economics ,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Cambridge , MA : Blackwell , 2001.
- [ 100 ] Yang , X. and Y-K. Ng ,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 North-Holland , 1993.
- [ 101 ] Yang , X. and Y-K. Ng , "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 " ,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 1995 , 26 , 107—128.
- [ 102 ] Yang , X. , J. Wang , and I. Wills , " Economic Growth , Commercialization ,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Rural China , 1979—1987 " , *China Economic Review* , 1992 , 3 , 1—37.
- [ 103 ] 易纲 , " 生产效率和产权界定 " , 《中国 : 发展和改革》, 1988 年第 12 期。
- [ 104 ] 张纲 , " 政府干预和中国的乡村工业 : 地方政府的作用 " , 中国改革后乡村工业化研讨会 , 中国 , 北京 , 1993 年 10 月。
- [ 105 ] 张维迎 ,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9 年。也见张维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 No. 30 , 1986。
- [ 106 ] 周其仁 , " 把创业放到第一位来 , 把就业放到第二位去 " , 《经济学消息报》, 1999 年第 37 期 , 第 1 页。
- [ 107 ] Zhuravskaya , Ekaterina , "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 Fiscal Federalism , Russian Style " , Mimeo : Harvard University , 1998.

## Economic Reform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JEFFREY SACHS

( *Columbia University* )

WINGTHYE WOO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XIAOKAI YANG

( *Monash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reform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 emphasizing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within a country is the key factor pushing for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t compares Russia and China and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the two models of transi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economic transition will be captured by state opportunism under political monopoly. The dual track of economic transition forces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o incur very high long-run costs that surpass the short-run benefits obtained by buying the support of the vested interests. Economic transition of the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is a convergence to the world economy governed by the WTO rules. It is not an innovation leading to a different set of institutions.

**JEL Classification** P51 , O53 , P30